

20世纪后期

中国文学思潮分析

全球化也是让东方的文化终于有一天可以在多元边缘文化中，
变得可以听到自己的声音，在走向世界时，
全球化也是中国为自己寻找新的崛起的理由。我迫切地希望我
们可像西方国家那样，在网上建立我们的文学研究资料库，分
门别类地加以整理，供网上文学研究之用，也可以在网上建立
的网站和网页，供网上文学研究之用。中国文学二级学
科进行分类，供海内外学者参加讨论，可以很方便地将网上沙
龙的讨论成果整理出版，并且可以尝试中英两个语种，试行双
语制，这样既有利于向世界文论输送中国文论资料和最新成果，
又有利于提高国内的文学研究水平，更有利于改变互联网上中
外文学交流极不平衡的局面，进而为中国文学研究从边缘进入
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叶虎／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本书从问题意识出发，对能代表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七个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研究，不仅揭示出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显示出 20 世纪后期文学思潮的整体感，而且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做出了较为客观公允的价值判断。作者认为，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的内在逻辑是从新启蒙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及回到文学自身的努力，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转型所引发的文化的分化和对新启蒙的质疑与重建，再到超越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一元论文化发展模式”的全球化观与后现代式的持守差异、断裂、冲突、矛盾的全球化观的二元对立，走向交往、对话与建构之途。另一方面，作者还在肯定 20 世纪后期众多文学思潮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其局限之处也做了客观公允的分析。

ISBN 978-7-5059-5584-4



9 787505 955844 >

定价：22.00 元

20世纪后期

全球化也必将让东方的文化终于有一天可以在多元边缘文化中
变得一方可以以平等的姿态与另一方对话。在21世纪世界
全球化进程中，中国文学已寻找到了它崛起的原因，迅速崛起，我
们可像西方国家那样，在网上建立我们的文学研究资料库，分
门别类地加以整理，供海内外学者参

中国文学思潮分析

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等中国语言文学二级学
科进行分类，供海内外学者参加讨论，可以很方便地将网上沙
龙的讨论成果整理出版，并且可以尝试中英两个语种，试行双
语制，这样既有利于向世界文论输送中国文论资料和最新成果，
又有利于提高国内的文学研究水平，更有利于改变互联网上中
外文学交流不平衡的局面，进而为中国文学研究从边缘进入
中心创造有利条件。

◎叶虎／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分析 / 叶虎著.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059-5584-4

I. 2… II. 叶… III. 文艺思潮—研究—中国—20 世纪
IV. I209.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70083 号

书 名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分析
作 者	叶 虎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姚莲瑞
责任校对	松会敏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姚莲瑞
印 刷	北京市朝阳区小红门印刷厂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7.75
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59-5584-4
定 价	22.0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请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摘 要

本书的研究目的不在于一般性地介绍 20 世纪后期文学思潮的基本内容，或对文学思潮予以史的考察，撰写出一部事无巨细、丰赡翔实的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史，而是从问题意识出发，遴选出能代表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七个重要问题予以分析。这种分析不仅要揭示出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显示出 20 世纪后期文学思潮的整体感，而且还要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价值判断，以期对今后学术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参照。

本书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章至第四章为第一部分，主要通过对历史遗留问题、文学主体性理论、文艺学方法论及文艺本体论的论述揭示了这一时期新启蒙话语喧哗与文学思潮回归自身的趋势。第五章至第六章为第二部分，阐发了社会转型期文化的分化导致大众文化日益占据主导位置及中国后现代主义批评者对启蒙现代性的颠覆和解构的态势，指出大众文化对文学产生的影响，分析了当代大众文化批评所存在的问题，并强调要坚持现代性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有效互补，从而推进中国未竟的现代性工程，声明后现代主义不是中国文学、文论与文化的出路。第七章为第三部分，指出了两种全球化形态：一种是以西方启蒙理性为基础的“一元论文化发展模式”的全球化，一种是后现代主义式的全球化。本书指出，前者实际上奉行的是欧洲或美国中心主义，后者虽然强调差异、非中心、多元化，却走向了断裂、冲突和矛盾，因此本书主张一种超越二者局限的“交往、对话”全球化观，并以此为理论原则对文论、文化

◆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分析

“失语症”、“后殖民”等问题进行了分析，进而强调在交往对话的基础上进行文论、文化的创造和建构，从而在更高的基点上与西方文论、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通过上述分析，本书得出了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的内在逻辑：从新启蒙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宏大叙事及回到文学自身的努力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转型所引发的文化的分化和对新启蒙的质疑与重建，再到超越西方启蒙现代性的“一元论文化发展模式”的全球化观与后现代式的持守差异、断裂、冲突、矛盾的全球化观的二元对立，走向交往、对话与建构之途。另一方面，本书还在肯定 20 世纪后期众多文学思潮价值和意义的基础上，对其局限之处也做了较为客观公允的分析。

关键词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 文学主体性 文艺学方法论 文艺本体论 大众文化 后现代主义 全球化

Abstract

The book aims at neither introducing basic content of literary trend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nor writing a rich history of literary trends of Chin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after surveying literary trends in terms of history. It intends to sort out seven issues for analysis, which can represent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rends of Chin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 analysis not only reveals the logical relations of seven issues, and the unity of literary trends of Chin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but also provides a fair and objective evaluation of numerous and complicated literary trends in order to shed lights on the academic development.

The book consists of three parts. Part one (from chapter one to chapter four) unfolds the history of the discourse of new enlightenment and the tendency of literary trends returning to themselves through accounts of questions left over by history, theory of literary subjectivity,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and art studies, literary ontological theory.

Part two (chapter five and chapter six) clarifies the tendencies resulted from the disintegration of culture in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mass culture is increasingly taking the leading place; postmodern critics in China overturn and deconstruct modern enlightenment. It also points out the influence of mass culture on literature and analyzes problems of mass culture criticism. It stresses the mutual complement of modernity and postmodernism to speed up the project of nearing modernity in China. It also claims that postmodernism is

not the way out in terms of Chinese literature,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e.

Part three (chapter seven) points out two states of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of monistic 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based on Western enlightenment; globalization of postmodernism. The former is Europe-centered or America-centered, while the latter approaches rupture and conflict though it emphasizes differences, non-centeredness and pluralism. Therefore, the book proposes globaliz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dialogue, which will surpass limitations of the previous two globalizations. Based on this globalization, it analyzes literary theory, culture aphasia and postcolonialism in order to create and construct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e, and to perform a dialogue with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and culture on a higher basi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we can draw the conclusion of logical relations in literary trends of China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from enormous narrative of ideology discourse in the period of new enlightenment and efforts to reverting to literature itself, to cultural disintegration and questioning and reconstructing new enlightenment brought about by radical changes of society, economics, politics, and culture, to surpassing the antinomy between globalization of monistic culture development pattern of western modern enlightenment and postmodern globalization claiming differences, rupture, and conflicts, and finally to communication, dialogue and construction. Furthermore, the book has made an objective analysis of limitations of literary trend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based on confirming their value and significance.

Key words literary trend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theory of literary subjectivity; methodology of literary and art studies; literary ontological theory; mass culture; postmodernism; globalization

目 录

Contents

摘 要

导 论 / 1

第一章 历史问题的清理与反思

第一节 文学对政治的疏离与反思 / 18

第二节 人性、人道主义的回归与论争 / 30

第三节 反映论的质疑与思考 / 42

第二章 文学主体性的张扬与困惑

第一节 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发生学语境 / 61

第二节 文学主体性的理论价值 / 65

第三节 文学主体性的理论局限 / 72

第三章 文艺学方法论的启示与局限

第一节 文艺学方法论的启示 / 80

第二节 文艺学方法论的局限 / 82

第四章 文艺本体论的超越与困境

第一节 文艺本体论的生成语境 / 94

◆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分析

第二节 文艺本体论的表现形态 / 101

第三节 文艺本体论的困境 / 110

第五章 社会转型与大众文化的狂欢

第一节 大众文化的涵义及其特征 / 116

第二节 大众文化在中国大陆的行程 / 121

第三节 当代大众文化的主要影响 / 127

第四节 当代大众文化批评的思考 / 143

第六章 当代中国文论中的后现代主义话语

第一节 后现代主义与现代性的关系阐释 / 157

第二节 后现代主义文艺与美学的基本特征 / 166

第三节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 / 171

第四节 后现代主义在中国的价值与局限 / 175

第七章 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与文化

第一节 全球化与本土化 / 192

第二节 全球化、后殖民与中国文论的“失语症” / 199

第三节 交往、对话与建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文论与文化 / 217

主要参考文献 / 226

后 记 / 240

导 论

本书的研究目的不在于撰写出一部事无巨细、丰赡翔实的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史，而是从问题意识出发，拎出能代表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发展的七个重要问题予以分析。这种分析不仅要揭示出问题之间的内在逻辑，显示出 20 世纪后期文学思潮的整体感，而且还要对纷繁复杂的文学思潮做出较为客观公允的价值判断，以期对今后学术的发展提供可供借鉴的参照。需要提及的是，文学思潮包括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等各方面，本书论述的重点主要在前两个方面。除非特别标明，本书中的年代均指 20 世纪的相应年代。

一、本书的内在逻辑

（一）新启蒙话语的喧哗与回归自身的文学思潮

20 世纪后期中国文学思潮的发轫无疑与 70 年代末崛起的新启蒙主义精神潮流连接在一起。这种新启蒙主义承续了五四时期倡导的科学、民主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所强调的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相一致，以国家民族的现代性宏伟叙事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身处新启蒙语境的人文知识分子重新点燃了久已泯灭的兼济天下的豪情，融会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的主流话语中，在历史的反思中重新确立现代性的价值理想。

之所以对文学思潮的历史加以回顾，其重要意义在于对历史的回望与思索为以后的文学思潮预设了前提，铺平了道路，规约着文学思潮发展的路径。对历史问题的清理主要涉及三个

方面：一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二是人性、人道主义问题；三是反映论问题。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长期以来被定格为“从属”、“工具”，所谓“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致使文学被捆绑在政治的战车上，失却了自身的相对独立性，给文艺事业造成了很大的危害。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为人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讨论的结果是代表主流意识形态的《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正式提出用“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口号。解脱政治缰绳后的文学在文学理论界、创作界及文学史的写作上掀起了一股全面疏离政治、高扬文学审美特性及“内部规律”研究的潮流。这股潮流究其实质就是文学逐步逃离政治的统摄，回归自身，而文学与政治之间关系的重新调整和阐释正是文学摆脱婢女地位、摆正自己位置的一个重要前提。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在 70 年代末重新登场并延续到 80 年代中期，一方面针对建国以来时断时续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时期极“左”政治对人的尊严的践踏，对人的价值的毁灭；另一方面又是对被遮蔽在历史地表之下的五四时期及建国后人性、人道主义呼唤的回应。对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虽然其间经历了权力话语介入而产生了波折，但却为日后文学主体性理论的出场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嗣后一切对于这个问题（指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引者注）的肯定性的论述都从这一文化氛围中得到了好处，当 80 年代中期刘再复再次出来讨论这个问题时，就有了一个较好的学术气氛。”^①对反映论的质疑与思考可以说是贯穿 80 年代以来文学思潮的一条红线，因为无论是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对审美反映论的纠偏，还是对

① 庄锡华：《80 年代人性人道主义的两次讨论》，《文艺争鸣》，2001 年第 5 期，第 18 页。

文艺本体论的强调，都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反映论特别是被歪曲的机械反映论。由此所引出的一个核心问题是对哲学认识论的反映论的简单化、机械化思维加以反拨，使文学研究更能体现出自身的特殊规律。对这种特殊规律的关注，其实正是新时期文学思潮回归自身的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争取自身合法性的一种努力。

文学主体性理论的提出衔接了“文学是人学”、人性、人道主义讨论的余波，又在此基础上加以深化。它所强调的“主体性”与其说是群体的、人类的、实践的，毋宁说是个体的、精神的。它尽管承认“文学是人学”不容否认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也指出了这个命题的不足，强调必须予以三个层次的深化：不仅要承认文学是精神主体学，而且要承认文学是深层的精神主体学，是具有人性深度和丰富情感的精神主体学，进而文学不仅要尊重某一种精神主体，而且要充分尊重和肯定不同类型的精神主体。^①文学主体性话语的一个重要理论价值在于突破了“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的理论藩篱，实现了研究重心从客体向主体的推进，由外部向内部的转换。这为文学回归自身迈出了重要一步。另一方面，文学主体性理论对感性、个性、自由的强调和呼唤，使个性解放和个体意识迅速觉醒，又为中国当代社会摆脱精神禁锢注入了更加强大的思想力量。

文艺学方法论勃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反映论和社会—历史批评在阐释某些具体文本时陷入了捉襟见肘的窘境，而西方形形色色的文论、文化思潮无疑为处于新启蒙语境下的中国提供了理论资源和话语参照。这种借鉴是全方位的，从自然科学的“老三论”、“新三论”到现代心理学、文化人类学、

① 刘再复：《论文学的主体性》，见何火任编：《当前文学主体性问题论争》，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58-59页。

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等，应有尽有。可以说，在 80 年代，从初期零散的不成系统的介绍，到中后期大规模的引进，我们几乎在短短的 10 年中匆忙操练和完成了西方百年文论的历程。新方法的输入无疑为从多角度多侧面研究文学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平台，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诸如存在着不求甚解、生吞活剥、生搬硬套的弊病，术语的爆炸和滥用使得异常火暴的方法热潮显得茫然和无序，而对自然科学方法的崇拜和无限度运用使得一些学者惊呼文艺本体的失落。于是他们纷纷将探寻的目光聚焦于文艺本体。

文艺本体论的出场，显然是对文学认识论的“文学是现实的反映”及科学主义文论的“文学是有控制的信息反馈系统”的反拨，它受到了文学主体性理论对精神主体探讨的影响，又在“西方语言论转向”、“形式本体论”等思潮的策动下，伴随着新时期文学的“向内转”，以不可阻遏之势铺展开来。文艺本体论主要有两种表现形态：人类学文艺本体论和作品、形式或语言本体论。从精神内核上说，前者更接近于文学主体性理论，因为两者“都是建立在人的基点上，是以人的觉醒、自由和创造为前提的”^①，从而人类学文艺本体论在探讨文艺自身规律的同时，更富有新启蒙色彩。相对而言，作品、形式或语言本体论往往更专注于文艺自身独特规律的探讨，新启蒙的意识形态功能逐渐弱化。在文学进一步走向回归自身的同时，也愈来愈将文学与外部世界相隔离，进而日益陷入一种自足狭窄的封闭体系。

由上可见，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的中国文学思潮一方

① 陈剑晖：《文学本体：反思、追寻与建构》，转引自严昭柱：《关于文学本体论的讨论综述》，《文艺理论与批评》，1990 年第 6 期，第 126 页。

面在反思批判改革前社会主义失误的基础上推进全民性的现代性追求，为中国社会的改革提供了巨大的解放力量，成为支配中国知识界的主要思想倾向。与此同时，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理论与批评，都逐渐地与政治疏离，对文学主体性和本体性的强调，使得“回归文学本身”日益成为 80 年代中国文学思潮的一个趋势。在这种充满理想主义的现代性追求中，西方的文论、文化资源无疑成为中国文艺学界的一个重要参照系。可以说，这种交流、引进大大推进了中国文学、文论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主动的“拿来主义”并不意味着中西方已经在对等的位置上展开对话，更不表明中国文论建设已达到了面对中国文化、文学实际的原创性境界。这也就为 90 年代“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文论与文化”问题的探讨埋下了伏笔。

（二）市场经济的狂澜与文化的分化

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是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逐步转型和确立。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经济体制改革，而且还对中国的政治、文化乃至人们的生活方式、思想观念、价值取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面对迅速变迁的社会转型，高扬主体性自由和解放旗帜，并以推进民族国家现代化为己任的人文知识分子新启蒙话语，转眼之间变得茫然失措，无所适从，逐渐丧失了批判和诊断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能力。正如汪晖所指出的：“中国的启蒙主义面对的已经是一个资本化的社会：市场经济已经日益成为主要的经济形态，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已经把中国带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之中，在资本运动过程中，国家及其功能也相应地发生了虽然不是彻底的、但却是极为重要的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已经造就了它自己的代言人，启蒙知识分子作为价值创造者

的角色正面对深刻的挑战。”^①新启蒙的受挫更引起了中国某些后现代主义批评者的热烈响应，他们纷纷宣告现代性已经终结，启蒙走向破产。与之相应，80 年代以“时代代言人”、“灵魂工程师”形象自居的人文知识分子在商品意识无孔不入的挤压下，由中心滑向了边缘，在自我角色选择和价值定位上普遍陷入了一种尴尬、落寞、困惑、焦灼的精神境地。作为对这一境遇的回应，曾经基本上作为文化整体的精英阶层已不复存在，他们或成为体制认可的大学教授、学者、社科系统的研究人员，或成为文化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老总、职员，或成为自由撰稿人、民间画家、独立制片人等体制外艺术家，等等。相应地，80 年代中、前期一体化的文化结构也逐渐崩溃，走向分化，形成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主流文化（或称为官方文化、正统文化）、精英知识分子文化（或称为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等三个文化圈。在市场经济这只“无形的手”的操纵下，铺天盖地的大众文化不仅得以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精英知识分子文化分庭抗礼，而且实际上已经成为时代文化的主流。

大众文化其实在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就已经登场，起先是以港台流行歌曲、电视剧、通俗小说等形式涌进封闭多年的中国大陆，与当时的精英文化共同担负起思想解放的职责，得到了精英知识分子的捍卫和支持。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大众文化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空间，迅速走向繁荣，在 80 年代中期引起了作家、评论家的关注。80 年代末，大众文化进一步呈繁荣态势，而严肃文学则日益走向边缘化，以至于 80 年代初以意识流手法令文坛焕然一新的王蒙，直接以“文学：失去轰动效

①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见孟繁华主编：《九十年代文存》（1990—2000）（上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 263 页。

应以后”^①为题揭示了这一令精英知识分子尴尬的局面。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大众文化更是以绝对的优势占据了时代文化的主流位置。大众文化的俗化乃至媚俗的趋势成为90年代“人文精神”讨论的诱因之一。这场声势颇为浩大的论争显示了人文知识分子对现实人生的理性关怀精神，他们对工具理性、消费主义、实用功利主义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切中时弊，具有不可否认的价值，然而富有悖论意味的是，大众文化的勃兴和繁荣也正应和了倡导“人的解放”、“审美感性化”的精英文化，可以说正是后者的理论和文化实践为大众文化的发展做了舆论上的准备。^②不仅如此，关于大众文化的研究已经突破了80年代回归文学本身思潮的囿限，它所研究的对象涉及到商业电影、畅销小说、电视剧、各种形式的广告、通俗歌曲、休闲报刊、卡通音像制品、MTV、时装模特表演、营利性体育比赛等；它已经不以纯而又纯的审美特性、形式、语言的研究为最终目的，相反，曾经一度为文学主体论、文艺本体论所拒绝的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权力等所谓的“外部因素”却成为大众文化研究孜孜以求的鹄的。另一方面，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界限的消解抹平了经典与非经典、高雅与通俗的区别，80年代固守的等级观念和批评标准已经失效。

与之相关联，后现代主义的出场显然为大众文化的狂欢奠定了理论的基础。后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界限，为大众文化的出场欢呼雀跃。詹姆

① 参见王蒙（署名阳雨）：《文学：失去轰动效应以后》，《文艺报》，1988年1月30日。

② 黄力之：《中国话语：当代审美文化史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316页。